

刘师培对康有为变法理论的经学驳难

李 帆

(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, 北京 100875)

摘 要:刘师培对“古文伪经说”的驳难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,一是从梳理今古文经的关系入手,阐发自己的看法;二是以《左传》研究为核心,批驳今文学家的说法。整体而言,驳难确在某些方面击中了要害,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发挥了应有作用。但这一驳难毕竟是在传统领域中进行,缺乏经学以外的现代学术资源的介入,加之受制于双方固有的学术门户,所以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。

关键词:刘师培 康有为 经学

中图分类号:K206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0-2987(2010)04-0076-05

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基本依据,戊戌变法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。戊戌后康有为仍然坚持“两考”的基本主张,坚持维新保皇路线,比之当时激进的革命派,其主张已趋落伍,但仍有相当大的影响。为了破除康有为的影响,推进排满革命事业,章太炎、刘师培等革命派阵营的学者担负起了以学术破解康说的重任,力图从经学辩难的角度摧毁康说。关于章太炎对康说的驳难,学界成果较多。而刘师培对康说的驳难,却相对不太引人关注,且现有成果仍存开拓空间。故本文拟以刘师培对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的驳难为例,从经学、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展开论说。

1903~1908 年间,刘师培陆续写作和发表《读左礼记》、《六经残于秦火考》、《汉初典制多采古文家考》、《古今文考》、《书魏默深〈古微堂集〉后》、《汉代古文学辨诬》、《王鲁新周辨》、《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》、《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》、《论孔学不能无弊》、《论孔子无改制之事》、《王制篇集证》、《西汉今

文学多采邹衍说考》等文章,批驳康有为以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、学术主张。

在《新学伪经考》中,康有为全面阐发了他的“古文伪经说”,认为东汉以来占据经学主要地位的古文经,其典籍全是假的,全系刘歆出于媚莽篡汉目的而伪造的,可称之为“新(莽)学”、“伪经”,与孔子儒学无关,故应予废弃,而今文经才是真正的经典。《春秋公羊》学、“公羊三世说”为儒学正宗,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,是唯一应该奉行的学说。“古文伪经说”并非康有为独创,而是康有为自刘逢禄、宋翔凤、龚自珍、魏源、廖平等人处吸纳学术资源后形成的,康是此说的集大成者。

刘师培对“古文伪经说”的驳难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,一是从梳理今古文经的关系入手,阐发自己的看法;二是以《左传》研究为核心,批驳今文家的说法。

在今古文经的关系方面,刘师培认为,汉代以前经无今古文之分,今古文经的差异主要是文字差异。在他眼里,六经在孔子之时被作为教本以传授,“弟

收稿日期:2010-03-10

作者简介:李帆(1961-),男,辽宁抚顺人,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。

基金项目: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“刘师培与清代经学”(06JA770003)。

关于刘师培驳难康有为的学术成果,主要有陈奇《刘师培的今古文观》《近代史研究》1990年第2期;陈奇《刘师培思想研究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;方光华《刘师培与晚清经学研究》,载彭林主编《清代学术讲论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;路新生《刘师培的古文经学研究及其现代史学意义》《经学的蜕变与史学的“转轨”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,等等。

子各记所闻，故所记互有详略，或详故事，或举微言，详于此者略于彼。所记既有详略，因之而即有异同，然溯厥源流，咸为仲尼所口述。”^{[1]1374} 尽管所记有异，但当时并无门户之见，亦无今古文之分，“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，犹今日所谓旧板新书也。《说文·序》言：孔子书六经，皆以古文。则秦代以前，六经只有古文，无今文。汉代之所谓古文经，乃秦代之时，未易古文为秦文者也，其故本至汉犹存。”“所谓今古文者，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先后之殊，非以其义例亦有不同也。”^{[1]1378,1377} 不仅如此，他还认为古文经基本可信，西汉初年学者多治古文学。针对古文经为伪的看法，他以大量例证辩驳之，逐个证明《周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等古文经传的真实可靠性，并指出：“秦汉之间，古文之学虽残佚失传，然未尝一日绝也。”“西汉初年，古文之学未尝不与今文并行，特武帝以后立于学官者，均属于今文，由是古文之学不显。”^{[1]1382,1383} 而且强调今古文立说多同，西汉今文家也不废古文，“西汉儒生之说经，以古文之经参以今文之说，以今文之经参以古文之说……汉儒曷尝划分古今二学若冰炭之不相容哉？”例如，《五经异义》一书，于今文古文辨之最严，于先儒之说，必著明某说为今文家言，某说为古文家言。今就其书所引者观之，则今文之说同于古文，而古文之说同于今文者，计有九条。”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“西汉之初，无今文古文之争。盖博士未立，不以经学为禄利之途，故说经者杂引今古文。及今文立于学官，然后所学定于一尊。然舍古文而专说今文者，惟末师俗儒则然耳。若今文大师则不然，于古文之说，旁收博采，所引之说，不必定出于今文，是犹治古文者兼用今文之说也。足证西汉治今文者，并不以古文家言为伪，亦不以古文家言为可废。”^{[1]1380,1383}

在《左传》研究方面，刘师培所下功夫颇深，他虽未继父祖之业完成《左传旧注疏证》，但对《左传》研究仍有多方面贡献。他的核心主张是《左传》并非刘歆伪造，它是解《春秋》经之作，所谓《左传》不传《春秋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。他对《左传》的学术传承系统进行了梳理，认为《左传》成书以来，相传不绝，战国时有荀子、韩非子对它进行研究，西汉时也有贾谊、刘安、司马迁、翟方进等对它进行研究^{[2]292-301}。而且他还专门探讨了司马迁《史记》的书法体例，证明《左传》对司马迁创作《史记》产生过重要影响^{[3]1375-1367}。由于这些学术工作都做在刘歆之前，所谓刘歆伪造《左传》说就不攻自破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通过引证先秦诸子如

《韩非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以及西汉《淮南子》、《春秋繁露》等书籍中对于《左传》的直接、间接引用，证明《左传》在刘歆之前早已存在^{[4]1215-1216,1216-1218}。在《左传》与《春秋》的关系上，刘师培认为《左传》不仅传《春秋》，而且它对《春秋》的解释要比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详尽得多。他指出，《韩诗外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都有“《春秋》之记”、“《春秋》戒之”的记录，将以上诸典籍涉及《春秋》云云的史实与《左传》比勘，不仅史事相同，而且遣辞用语的先后相袭也明白无误。由此可知以上诸典籍的《春秋》即是指《左传》^{[5]1215,296-297}。他还认为，“《春秋》者，乃本国历史教科书也，其必托始于鲁隐者，则以察时势之变迁，当先今后古，故略古昔而详晚近，则《春秋》又即本国近世史也。……时门人七十，弟子三千，各记所闻，以供参考。而所记之语，复各不同，或详故事，或举微言，故有左氏、穀梁、公羊之学。然溯厥源流，咸为仲尼所口述，惟所记各有所偏，亦所记互有详略耳。”^{[2]296} 即《春秋》三传的差别，源于孔门弟子记录的差别，源于孔门弟子学术兴趣的差异，三传都是解释《春秋》的作品，并无例外，所以《左传》当然为刘歆之前的解经之作。

二

在《孔子改制考》中，康有为全面阐发了他的“孔子改制说”，认为孔子是一位改革家，是素王、圣人、教主，六经皆为其所作，是其改革主张的寄托，六经所提及的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的遗文圣训，实际上是孔子自己的主张，只是假托这些权威以便于推行而已，所谓“托古改制”。康有为的用意在于说明，既然千百年来备受尊崇的孔子尚且是一位改革家，则今天的维新变法是合于圣人之制的。他宣扬孔子以“布衣”改革周制，旨在号召士子以孔子为楷模，投身于现实的“改制”运动。他奉孔子为教主，隐然以现代孔子自居，实则是希望当今天下人皈依他这位现代孔子。

针对康有为的“孔子改制说”，刘师培予以系统驳难，从几个方面展开自己的论说：

首先，孔子不是改革家，不是素王，并未作六经。在刘师培看来，孔子实际是一个守旧派，因为他“从周制”，“谓之改古制不可，谓之改周制犹不可，”^{[6]1394} 而且其学说“与政治无涉”。因为从古迄今，中国的“改制”之权均由帝王操纵，平民布衣无权干预，康有

为说孔子“以庶民而改制”将其学说看作政治改革学说,那是康氏“利用孔学”、“缘饰古经,附会政治”而造出来的。为了证明孔子是改革家,康有为袭用今文家的说法,声称孔子是“素王”,虽无王者之位,却有王者之德,孔子为改制而作六经。刘师培则认为,称孔子为“素王”,盖缘于今文家以讹传讹,即今文家对孔子“据鲁、亲周、故宋”一语的讹传。“据鲁、亲周、故宋”意为孔子记事以鲁为主,以鲁、周为至亲,以宋为殷商古国之后。古代“据”字音义近于“主”,西汉初年误“据”为“主”,又进而误“主”为“王”,遂有“王鲁”之说,何休注《春秋繁露》时就沿用了这一错误。《公羊传》宣公十六年传文误“亲”为“新”,汉儒于是有“新周”之说。这样,“据鲁、亲周、故宋”就讹为“王鲁、新周、故宋”。而且“汉儒既创新周、王鲁之讹言,犹以为未足,更谓孔子以《春秋》当新王”,但孔子毕竟不在王位,于是又援引纬书中“素王”二字,说孔子就是“素王”。实际上,先秦以前“无有称孔子为素王者”^{[6]1397,1398}。孔子不仅不是素王,而且也并未为改制而作六经。因为《管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墨子》的作者,或早于孔子,或与孔子同时,书中所引多与今本六经相同,足证“孔子以前,久有六经。孔子之于六经也,述而不作”^{[7]1402-1405,1374}。所以,孔子只是传道授业的先师,而非创法改制的先圣。

其次,讖纬和五德终始说是改制论的根源。康有为的理论体系,远绍今文《公羊》义法,该义法的创始人是董仲舒,故而康氏主张“因董子以通《公羊》,因《公羊》以通《春秋》,因《春秋》以通六经,而窥孔子之道本。”^{[8]307}董仲舒学说与讖纬之学和五德终始说息息相关。清理董氏学与康有为改制论的关联,揭穿讖纬和五德终始说是改制论的根源,便易于击破康有为。所以刘师培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,他指出:“盖改制之说,本于讖纬,董子纂其说于《公羊》,以《公羊》有‘改周之文、从殷之质’一语,遂疑孔子不从周。又见《公羊》所言礼制与他经不同,遂疑为孔子所定新王之制。复因张三世、存三统之说以推之,而新周、故宋、黜杞之说生。夫张三世者,所以明人群之进化;存三统者,所以存历代之典章。若如董子之说,则《春秋》既从殷之质,何以又有故宋之词?既以王鲁为宗,何以又有新王即孔子?其说本扞格鲜通。”^{[6]1411}以此“扞格鲜通”之说作为改制的根源,显然荒诞。刘师培进而指出,五德终始说虽起源甚早,但和原始儒学没有关系,西汉时讖纬和五德终始说流行,为的是“媚

时君”,满足汉武帝的“求仙”欲望,所以这样的学说具有维护专制统治和“反民主”的特性^{[9]1396-1397,1228}。而康有为的改制论源于此“反民主”、“便君王”的学说,必须予以批驳。

再次,孔子非宗教家。刘师培认为,孔子之前中国就有宗教,孔子并未创教,“孔子未立宗教之名,孔子所著书,偶有言及‘教’字者,皆指教化、教育言。”不仅如此,“唐宋以前,孔教之名未立,”人们以“儒学”或“儒术”称孔学,“至韩愈信儒,辟老、佛,明人李贽又谓‘三教同源’,而孔子俨然居教主之一矣。不知孔子受学士崇信者,不过以著述浩富,弟子众多,而又获帝王之表章耳,于传教无涉。……奉孔子者,本无迷信之心,而使人立誓不背矣,与西教强人必从之旨大相背驰,岂得以宗教家称之哉?若后世崇奉孔学,不过由国家之功令、社会之习惯使然,非真视孔子为圣神也。则孔子之非教主,确然可征。”^{[6]1399,1400}所以孔子绝非宗教家、绝非教主。

三

刘师培对康有为变法理论的经学驳难,发生于戊戌变法之后排满革命风潮兴起之时。时代的风云剧变,政治立场的对立,学术流派和见解的迥异以及思想主张的不同,使得这一驳难呈现出多重因素交汇的历史面貌。

系统梳理刘师培评论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的文字,可以发现,刘氏对两书的驳难在出发点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,即文化与政治因素在其中各有所重。这当然是基于康氏著作的意旨之别,有针对性地予以驳难。众所周知,《新学伪经考》的核心是“古文伪经说”,即古文经典籍全是假的,都是刘歆出于媚莽篡汉目的而伪造的。《孔子改制考》的核心是“改制”,宣扬孔子以“布衣”改革周制,目的在于号召士子以孔子为楷模,投身于现实的“改制”中。对康有为而言,《新学伪经考》是“破”,《孔子改制考》是“立”,“破”的是千百年来士人奉为圭臬的经典,“立”的是一种打着圣人、教主旗号得以施行的新制。前者文化意义相对浓厚,后者政治意味更为突出。

《新学伪经考》之“破”,当然有助于破除人们对经典的迷信,解除改制的思想障碍。但同时又有负面效应,即易导致对历史的轻忽和蔑视。就像有学者评价章太炎批驳康有为时论,章氏对此负面效应深有所感,故他之批康“并不是站在古文经的门户之见

之上,而是要维护历史”因“六经都是历史,但康有为那批今文经师认为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,即以古史为伪,而今文家又重微言而轻事实”^{[10]192、191}。章太炎如此,刘师培也是如此。他具有古文经学家所普遍持有的理念,即重史,而且认同“六经皆史”之说,尽管比之章太炎,他受经学束缚更深。所以他对康有为的驳难,同样是站在文化立场上,视历史为本体和文化的根,有着对民族历史、文化传统“存亡续绝”的深层关怀和长远计虑,文化民族主义意味颇浓。他从史实出发对今古文经关系的梳理,对《周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左传》等古文经传真实可靠性的考证,都体现出这方面的良苦用心,正如其所言:“至近人创伪经之说,扶今文而抑古文,于汉代古文之经均视为刘歆之伪作,而后人人有疑经之心,于典章人物之确然可据者,亦视为郢书燕说。吾恐此说一昌,则古文之经将废,且非惟古文之经将废已也,凡三代典章人物载于古文经者,亦将因此而失传,非惟经学之厄,亦且中国史学之一大厄矣。故即今人之疑古文经者,陈其说而条辨之,以证古文经之非伪。”^{[11]1374}所以,他以古文经学家所擅长的以经证史、以史证经的手法,经史结合,以充分的证据论证康说之谬。整体考察,他这方面的论述,其系统性、完整性超过了章太炎,而且给予后人如钱穆的相关论述以颇大启示^{[11]211-212}。

《孔子改制考》之“立”旨在改制,在戊戌变法之时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戊戌之后,康有为仍紧抱着维新保皇之旨,所“立”者没有变化,自然为主张排满革命的刘师培等人所不满。虽然说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一方与章太炎一方在观点上有所分歧,但仍属进步政治阵营内部的分歧,不过到了戊戌变法失败和义和团运动后,形势剧变,排满革命风潮兴起,而康有为却止步不前,双方的分歧就不再是一个阵营内部的分歧了,而是不同政见之争了,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所以,刘师培对改制说的批驳,更多是着眼于政治上的考虑,欲为排满革命扫清理论障碍。而保皇与排满或拥清与反清的政治立场差异,不可避免地同民族主义纷争联系在一起。康有为强调的是“进夷狄于华”的《春秋》之义,主张拥戴满清统治;刘师培、章太炎等则强调夷夏之防。刘师培说:“《公》、

《穀》二传之旨,皆辨别内外,区析华戎。吾思丘明亲炙宣尼,备闻孔门之绪论,故《左传》一书,亦首严华夷之界。”^{[12]293}章太炎说:“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,而可混淆满、汉以同熏莸于一器哉!”^{[12]174}这样的主张,自是为排满革命服务的,而与康有为修修补补的改制有天壤之别。由此可见,政治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了双方民族主义认同的歧异。进而言之,民族主义视角可谓是理解刘师培驳难康有为的关键,无论在学术上,还是在政治上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刘师培对康有为的驳难还关联到学术与思想、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。就学术背景和治学取向而言,刘、康二人显然差异较大。从小学入手的古文经学背景和训练,使得刘师培之学根基深厚、坚实可信;而讲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的熏陶,则使得康有为的学说恣肆泛滥,给人以巨大的心灵冲击。前者更近于今日所谓“学术”,强调论题是否合于学理,论据是否充分,论证是否严密;后者更近于今日所谓“思想”,强调论题作用于人的精神,引发人的思考。刘师培正是用这样的“学术”标准看待康有为的论说,加之对今古文经的价值又有自己的高下之断,有时难免忽略康说的思想特质,如对康氏改制论的全盘否定,不少是基于古文经学不相信讖纬和五德终始说的学术判断,而对康氏借古人之说启今人之蒙的思想意义视而不见。由于不是在同一层面上谈问题,故而这样的交锋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。

刘师培对康有为的驳难也突显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。在治学上,刘师培一向主张“学术持平”,“不主门户”,“治通儒之学,所以治经时提倡‘举汉儒所谓今文、古文者兼收并采’”。但“刘君不反对今文经说,而反对今文家目古文经为伪造及孔子改制托古之说也”^{[13]30}。即刘师培学术上是能包容部分今文说的,而经说一旦与政治相关,他的立场就颇为鲜明,对康有为的驳难即体现出他作为革命派学者的基本立场。时人曾评述康有为之学是“以经术作政论”,刘师培甚至不将康氏视作学者,他回顾清代今文经学演进历程的论著讲到同时代的王闿运、廖平等,却根本不提康有为,显示他并不认为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在

刘师培说:“记事之最详者,莫若古文之经,如《周官经》、《左氏传》是也;书之稍完善者,亦莫若古文之经,如《毛诗》是也……惟见于古文之经者,则大抵近于证实。”“夫近儒之辟古文,必援引今文以为重。以今文为是,故以古文为非。惟就汉代之经术观之,觉经学之中,古文为优,而今文逊于古文。”见《汉代古文学辨诬》《左龠外集》卷四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第1374、1392页。

学术上的传承人。但从刘师培对康有为的驳难看,某些理路二人恰恰一致,即刘氏也是“以经术作政论”,以经术宣扬他的排满革命主张,强化他的排满革命立场。

整体而言,刘师培对康有为的驳难确在某些方面击中了要害,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发挥了应有作用。但这一驳难毕竟仍属传统领域中的辩难,以经攻经,缺乏经学以外的现代学术资源的介入,加之受制于双方固有的学术门户,所以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,留下了诸多有待后人进一步解决的学术问题。

[责任编辑 乔林晓]

参考文献:

- [1]刘师培.汉代古文学辨诬·左盦外集·卷四[A].钱玄同,等.刘申叔先生遗书[Z].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排印本,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重印.
- [2]刘师培.读左札记[A].刘申叔先生遗书[Z].
- [3]刘师培.司马迁左传义序例·左盦外集·卷三[A].刘申叔先生遗书[Z].
- [4]刘师培.周季诸子述左传考·左盦集·卷二[A].刘申叔先生遗书[Z].
- [5]刘师培.左氏不传春秋辨·左盦集·卷二[A].刘申叔先生遗书[Z].
- [6]刘师培.论孔子无改制之事·左盦外集·卷五[A].刘申叔先生遗书[Z].
- [7]刘师培.论孔子无改制之事·左盦外集·卷五[A].刘申叔先生遗书[Z].
- [8]刘师培.汉代古文学辨诬·左盦外集·卷四[A].刘申叔先生遗书[Z].
- [8]康有为.春秋董氏学自序[A].姜义华,等.康有为全集·第二集[Z]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7.
- [9]刘师培.论孔子无改制之事·左盦外集·卷五[A].刘申叔先生遗书[Z].
- [10]刘师培.西汉今文学多采邹衍说考·左盦集·卷三[A].刘申叔先生遗书[Z].
- [10]汪荣祖.章氏原经[A].章太炎研究[Z].台北:台湾季敖出版社,1991.
- [11]路新生.刘师培的古文经学研究及其现代史学意义[A].经学的蜕变与史学的“转轨”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.
- [12]章太炎.驳康有为论革命书[A].章太炎全集·四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5.
- [13]钱玄同.刘申叔先生遗书序[A].刘申叔先生遗书[Z].

Liu Shi-pei's Refutation to Kang You-wei's Reform Theory

LI Fan

(History College,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, Beijing 100875, China)

Abstract: After Wuxu Reform, Liu Shi-pei refuted Kong You-wei's reform theory. In Liu's viewpoint, guwenjing was credible, and *Zuo Zhuan* was not fabricate by Liu Xin, and Confucius was not ancient king. Through the refutation Liu showed his ability of guwenjingxue, and obviated the hindrance of anti-Manchu revolution.

Key words: Liu Shi-pei; Kang Youwei;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